

科学研究躍進文集

馮友蘭哲学思想
批判文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科学研究跃进文集

馮友蘭哲学思想批判文集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編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58年·北京

馮友蘭哲學思想批判文集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編

*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

中國人民大學印刷廠印刷

(北京 蘭州 西安 石家莊 蘭州 鄭州)

*

書號：2097 开本：850×1168 版1/32 印張：4½

字數：118,000 冊數：1—1000

1958年10月第1版

1958年10月第1次印刷

統一書號：2011·20

定價(7)：0.45元

說 明

在社会主义大躍進的形勢鼓舞下，很多兄弟高等學校掀起了科學研究大躍進的運動，並以研究成果作為國慶九周年的獻禮。這一運動，在中國人民大學是今年八月初，在學校黨委的直接領導下，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堅決貫徹群眾路線，充分發動全校師生員工開展起來的。經過一個多月以來的苦戰，全校的炊事員、公務員、工人、干部學生、研究生、教師和領導干部一齊動手動腦，寫出了調查報告、科學論文以及專門論著等共計四千多篇(部)；其中有些作品並取得了有關實際部門的大力支持與協作。這不僅在數量上相當於過去建校八 years 所完成論文篇數總和的四倍以上，而且在質量上也大大提高了。為了繼續提高和發揚我校這次科學研究大躍進運動的成果，廣泛聽取讀者和專家的意見，以便繼續修改和補充，現在我們將這些作品中的一部分專門論著編印為一套“科學研究躍進叢書”；另將單篇論文選編為一套“科學研究躍進文集”。由於這些作品都是在短期內以突擊的方式寫出的，其中欠妥以至錯誤之處，在所難免，希望讀者批評和指正。

中國人民大學科學研究部
一九五八年九月三十日

目 錄

拔掉哲学界的資产阶级白旗	李武林 (1)
批判馮友蘭先生“新的”新理學哲學思想	
想	李志遠、李武林、全春國 (16)
馮友蘭的新理學——封建买办王朝的御用哲學	楊憲邦 (28)
揭露馮友蘭新理學方法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	
實質	苗力田 (77)
批判馮友蘭的反动的唯心史觀	鍾宇人 (92)
批判馮友蘭先生的历史唯心主义	劉放桐(109)
揭露馮友蘭先生反动的哲学史觀	石 峻(122)

拔掉哲学界的资产阶级白旗

——馮友蘭“树立一个对立面”一文的思想源流与錯誤——

李 武 林

馮友蘭先生在“树立一个对立面”一文里說：“在全国大躍進的潮流里、哲学界发生了一些帶跟本性的問題。搞了几十年哲学的人，現在問：究竟什么是哲学？作了很久哲学工作的人也在問：我們究竟干什么？究竟培养什么样的人？”

我不同意这样的意見。因为在我看来，馮先生提出来的一些問題，在整个的哲学界并未发生。在我国的哲学界，許多有实际斗争經驗和理論修养的老同志，他們精通理論，并能运用理論解决实际問題。什么是资产阶级哲学，什么是唯一科学的馬列主义哲学，他們了解得很清楚；资产阶级哲学的反动本質，馬列主义哲学的任务他們体会也很深。就是一部分革命的青年知識分子，他們虽然实际斗争經驗不够，理論修养不高，我認為这样一些問題他們也不会发生。他們在一开始学习哲学时，首先在自己腦海里写下的是关于馬列主义哲学的原理，以及对旧哲学的批判。常常在他們进入哲学界时，第一堂課，第一次讀哲学教材就是講关于馬列主义哲学对象与任务的觀點。由于自己沒有旧哲学觀點的束縛，由于馬列主义哲学是唯一科学的哲学，由于馬列主义哲学引导了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事实証明：他們比較容易的就接受了馬列主义哲学对象与任务的觀點。馮先生冒整个哲学界之名，是十分錯誤的。

馮先生說：搞了几十年哲学工作的人，現在发生了这些問題，这倒是事实。但是决不是搞了几十年馬列主义哲学的人，而應該是

搞了几十年資產階級舊哲學與封建哲學的人。說精確一些，應該是搞了几十年舊哲學，在解放以後還不願真正接受改造，沒有放棄自己那一套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的資產階級哲學教授們，他們只有在馬列主義所指導的社會主義大躍進的潮流里，由於革命洪流的衝擊，自己的哲學沒有了散布的市場，喪失了經濟基礎，才開始真正考慮馬列主義這些哲學基本常識問題。以馮先生為例，難道什麼是舊哲學，馮先生不知道嗎？馮先生是美國哲學留學生，有名的大學哲學史教授，又有許多大部頭哲學著作，自己對哲學下過許多定義，現在發生這樣的問題，豈不是笑話嗎？這只可以說明：馮先生過去由於舊的唯心主義哲學觀點束縛根本沒有接受馬列主義哲學觀點，現在才開始考慮這些問題。

馮先生說：產生這些問題，是由於對哲學性質和任務進一步思考提出來的，正說明了上面這一點。我們要問：誰從哲學性質和任務進一步思考提出這些問題呢？仔細考慮一下，誰都知道就是馮先生自己。現在全國的建設事業都在黨領導下，在馬列主義指導下工作，馬列主義哲學應該是我們國家唯一的指導思想，大家說哲學就是指馬列主義哲學，馮先生又熟悉舊哲學，問什麼是哲學，就是問什麼是馬列主義哲學？馬列主義哲學干什么。我認為：馬列主義哲學工作者，是不會由於對馬列主義哲學性質和任務進一步思考，得出與馮先生一樣反馬列主義教育路線的結論來。這裡正好證明：是馮先生根深蒂固的唯心主義哲學思想反抗馬列主義哲學思想的表現，向馬列主義哲學挑戰。

馮先生說：產生這樣問題的原因，是由於許多黨政部門的負責同志理論結合實際，工作不但搞得好，並能作又紅又專的報告，寫出馬列主义的文章，學校及研究所工作的人，由於脫離實際，教授專家文章都寫不好。我認為：這就應該向黨政部門負責同志學習，理論要聯繫實際。然而馮先生却恰好相反，得出另外的結論，硬要鑽理論和實際分離的死胡同。

*

*

*

馮先生認為：馬克思主義者，一定要理論联系实际的，“但是，我們的社会中，工作是有分工的，因此有專搞或多搞理論工作的人，也有專搞或多搞实际工作的人。這一點我想大家是承認的”。馮先生主觀認為大家都承認的這一點，我們也不能承認。

首先：我們認為馮先生談的這種勞心與勞力的分工，在歷史上有一定原因和一定作用。但是，我們的社會是不是容許這種分工呢？不能。我們已經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正迅速地向社會主義躍進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中，雖然腦力與體力勞動差別今天還存在着，但它不會永恒的存在下去。

資產階級哲學家杜林曾經認為：從事物本性來說，存在於資本主義中的那種勞動分工，無論如何不能被排除掉。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指出：自發形成的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勞動分工，其必然結果是產品對生產者的統治。又說：階級劃分的基礎是勞動分工，如果舊分工存在，就不可能消滅階級。資本主義的勞動分工，從精神上和肉体上摧殘勞動者，使其腦力和體力得不到正常發展。因之恩格斯指出：“當社會掌握了全部生產資料，使之可以根據社會的計劃來運用它們的時候，社會就消滅了直到現在居於支配地位的，生產資料對人的奴役。自然，社會如不把每個人解放，它自己就不能得到解放。所以舊的生產方式，代之而起的，應該是這樣的生產組織，它使得一方面誰都不能把自己在生產勞動（人類生存的自然條件）中應參加部份，推到別人身上，另一方面，生產勞動供給每人以全面並運用自己的一切體力智力的可能。”可見馬列主義經典作家早已指示過我們，要消滅私有制度下使人殘廢不合理的分工制度，當社會掌握了全部生產資料以後，就應該建立使人能夠全面運用自己一切智力和體力的生產組織。事實上我們國家的今天，已經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恩格斯指示那種社會掌握全部生產資料的時候已經到來。黨根據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綫採取了許多措施，要加快社會主義建設速度，準備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條件。目前農村中掀起辦人民公社的高潮，黨提出的教育為政治服務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方

針，都与消灭资本主义制度遗留下来的社会分工有关，都是为开展社会生产力和消灭城乡对立，脑力与体力劳动对立的措施。馮先生認為我們的社会中，無疑應該存在这种分工的觀點，是絕頂錯誤的，这种分工論与我們的时代完全背道而馳。当社會已經掌握了全部生产資料的条件下，馮先生所說的社会分工論又失去了客觀經濟根源，再認為这种分工應該存在下去，是一种企圖使資本主义制度永恒存在，剥削阶级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偏見。

其次，就我們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而言，应不应该有“專搞和多搞理論工作的人”呢？如馮先生說脫离实际的，“系統鑽研經典著作，掌握文献資料，联系科学，分析概念范畴的人”呢？我認為不應該有。就理論和实际的关系來說，理論是實踐經驗的概括和總結，實踐是理論的泉源与发展的动力。一个人要掌握好理論，讀懂經典著作，了解概念范畴的真正意義，就不能單純閉門讀書，而要既讀書，又要与生产实践和阶级斗争实践結合起来，才能搞得懂，弄得懂。毛主席說过：學生的書本知識，“也是他們前人總結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經驗写成的理論，不是他們亲身得来的知識。他們接受这种知識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一定情況說來，这种知識对于他們还是片面的，这种知識是人家証明了的，在他們沒有証明的。”因之，毛主席一再指出：“你要有知識，你就得參加变革現實的實踐。”就一個人教理論課的目的來說，不能單純的為傳授知識，只教學生背誦教条，而要引导学生运用理論来解决实际問題。毛主席曾批判过那种脫离实际教理論課的人說：“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邏輯，教經濟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諸如此类。其結果謬种流傳，誤人不淺。”因此，我們不允许有什么脫离实际“專搞或多搞理論工作的人”。因为这样的理論工作不但不可能搞，而且对革命根本沒有好处用不着搞，甚至可以說它不是理論工作。毛主席說：“馬列主义着重理論，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指导实际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論，只是把它空談一陣，束之高閣，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論再好也沒有意义的。”由此可見，

我們絕不同意有所謂脫離實際的理論工作的意見。

是不是應該有不要理論指導“單搞或多搞實際工作的人”呢？我們認為還是不應該有。我們國家中，每一件工作都是社會主義大廈的齒輪及螺絲釘，都應當在馬列主義指導下進行。黨主張開展每一件工作都要先政治、後業務、業務為政治服務、政治指導業務，就明顯說明了這個道理。過去有人以為發展科學技術這種實際工作與馬列主義無關吧？其實，發展科學技術要人來執行、要發揮人們的創造性和積極性，就要馬列主義把他們武裝起來。科學技術要為政治服務，科學技術的方針政策也要人來執行。假若不要馬列主義指導，人們制訂或執行了錯誤的方針政策，迷失了方向，就會減低發展速度妨礙國家建設。可見發展科學技術都不應有不要理論指導的所謂實際工作者，而馮先生給“脫離實際的理論工作者”指定的崗位大學、出版社、圖書館這些文教機關的人，他們許多就是進行理論宣傳的工作，或與此有關，更不用說不要這樣的人。劉少奇同志在八大二次會議上說：“馬列主義是我們一切工作的理論基礎。全黨同志必須學會把馬列主義的理論運用到實際工作中去，把唯物辯証法運用到實際工作中去。”而且特別指出過：“各級黨委都應當注意黨內外思想動向，加強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注意理論問題，認真研究黨的路線和政策、堅決克服目前在許多地方許多部門中流行那種只談業務、不談思想的庸俗風氣。”而馮先生則提出一套理論為這種只談業務、不注意政治、不注意理論的庸俗風氣辯護。實際上馮先生是要具體工作部門脫離馬列主義的指導，走資產階級的道路。我們要堅決反對。

馬列主義認為：理論必須與實際結合，否則一事無成，每個人工作職務有不同，這種理論與實際聯繫的原則任何工作崗位都要貫徹。它的名言：“離開實踐的理論是空洞的理論，離開理論的實踐是盲目的實踐”，正教導我們這個道理，我們希望馮先生再体会一下它的意義。

再次：由錯誤的理論出發，馮先生認為：“綜合大學哲學系是

培养这样一种人才的地方……綜合大學培养出来主要是理論方面的人才。”这里又一次暴露了馮先生資产阶级的本性。因为在資产阶级学者看来，学校教育只能夠給学生以書本知識，“高超的理論知識”。而实践和經驗他們不算知識，生产劳动，体力劳动，体力劳动者，他們認為是卑下的，是絕路。馮先生这种主張正是鄙視实际，鄙視劳动的資产阶级教育方針。列宁早已批判过这种方針說：“資本主义旧社会遺留給我們最大禍害之一，就是書本与实践的分离”，又說：“沒有工作，沒有斗争，那末單从共产主义小冊子和著作中求得的書本知識，可以說一文錢不值，因为这种知識仍旧把資本主义旧社会可惡的特征，即理論与实际脱离的現象保留下去。”不联系实际的共产主义教条知識都一文錢不值，馮先生的封建教条和資产阶级教条可想而知。馮先生要把旧資本主义条件下学校教育的特征，强加于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学校身上，是完全錯誤的。我們知道党提出的社会主义教育方針，一方面是要教育与政治結合，为政治服务，反对关在房子里、埋在書本里、不关心阶级斗争、不关心国家建設的現象。一方面則要教育与劳动結合，为生产服务，在劳动过程中来改造学生的資产阶级思想，培养共产主义思想，获得真正的直接知識。就是要理論結合实际的学习、学习的目的为了更好为实践服务。毛主席提出我們教育應該培养的人：“在德育、智育、体育几个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正是与馮先生所謂綜合大學培养“高超的”理論方面的人才針锋相对的。我們是要培养劳动者，不是玩弄概念游戏的資产阶级老爷。馮先生这种办学方針，明显是自己在資产阶级大學所領会的一套为学术而学术，为理論而理論的东西，不适用于新中国的綜合大學。

馬列主义哲学系，应依照社会主义教育方針，依照哲学不但要說明世界，而着重要改造世界的精神，培养能胜任这种任务的战士。就是要培养学生成为掌握共产主义世界观，具有現代文化科学知識和身体健康的劳动者。毕业后他們是能在实际工作中运用唯物辯証法，能作思想政治工作，能作哲学教学和科学硏究工作，能进行

生产的劳动者，而不是只会背誦教条的書呆子。

* * *

馮先生提出这一套反对理論联系实际，反对社会主义教育路綫的理論，并不是偶然发生的，是他解放前那一套唯心主义反动哲學觀点的复活。特別是“新理學”一套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中，关于什么是哲学？哲学的对象与任务、哲学家的地位的觀点的复活。是他这些反科学的反动的觀点与馬列主义关于哲学的对象与任务的觀点的斗争。

“新理學”一書中馮先生說：“哲学乃自純思的觀点，对經驗作理智的分析，总括及解釋，而又以名言說出之者。”据馮先生自己的解釋譯成我們的話來說：就是在人們的思想中用思想对經驗作分析及总括以后，因之对所謂“眞际”有了一番理智的了解，此即所謂“理智的解釋”。馮先生对哲学下的定义，我們可以給他表述为：哲学是对所謂“眞际”的知識。

馮先生自己就說：“哲学以眞际为研究之对象”、“哲学对眞际有所肯定，而不特別对实际有所肯定”。要弄清楚馮先生的哲学觀点，我們首先要弄清楚他說的眞际是什么？依他自己的話來說：“眞际与实际不同，眞际指凡可称为有者”。这就是說眞际是与实际对立的，就是哲学史上一些客觀唯心主义者所說抽象的，精神性的“存在”。用他自己的解釋來說：“从类的观点以看眞际，則眞际是一个大共名，其类是一个大共类”，“从全的观点看……即我們將眞际作一个整体而思之。此整个即所謂全或大全，天地或宇宙是从全的观点以观万物，天地或宇宙是其总名，‘万物’亦用以指大全之观念。”可見这里馮先生所說的“哲学研究对象——眞际”，就是事物的名称、觀念、概念。这些觀念概念，馮先生不但認為它是脱离客觀世界的个别事物、脱离人的大腦而自己存在于客觀世界中，而且，他認為客觀世界的个别事物还要依照它才能成为实际的个别事物。“例如‘方性’、‘方之理’实际底方底物必須依照它才可成为实际底方底物。”这显然就是馮先生客觀唯心論的老祖宗柏拉圖的“理念”和黑

格尔的“絕對觀念”一流的貨色。

馮先生把觀念和概念認為是客觀存在的東西，並以它為哲學研究之對象是完全錯誤的。我們知道，觀念，一些事物的名稱也就是對它們的概念，只有高等動物——人才具有。因為人才有高級的神經系統，只有人才能在勞動中使自己的大腦得到鍛煉，有高度的抽象概括能力，才能概括許多事物的共性成為主觀的概念，認識它們的共同本質。但觀念和概念只是人們的主觀認識形式，只產生於人們頭腦中，存留於頭腦中。客觀世界不存在抽象的概念和觀念，而只存在個別的事物，事物的共性即寓於其中。只有經過人們對客觀世界的這些個別事物進行分析、綜合、抽象、概括，才能在腦子里形成概念。馮先生不了解一般寓於個別之中，把只有在人們頭腦中才有相對獨立性的概念，脫離頭腦而客觀化，變為認識的對象，這就犯了錯誤，因為思想認識思想是說不通的，荒謬的。

由於馮先生對哲學研究的對象是“眞際”，所以對哲學規定的任務就十分可笑了。他說：“哲學或最哲學的哲學，所有之觀念，命題，推論，多系形式底、邏輯底，其中並無或甚少實際內容，故不能與科學之命題，有同等實際效力。科學之命題我們可以用以統治自然，統治實際，而哲學之命題，尤其所謂最哲學的哲學中之命題，則不能有此用，因其對於實際並無主張，並無肯定，或甚少主張，甚少肯定。”又一地方說得更清楚了：“哲學所以不切實際者，因其不注意實際也。其所以不合實用，因其所講之眞際，本非我們所能用也。”

馮先生認為哲學對實際沒有作用，並不是偶然的，這是與他對什麼是哲學？哲學的對象之觀點一致的。因為他的哲學就是不以客觀世界為研究之對象，而以所謂“眞際”即思想為研究之對象，必然不能獲得對客觀世界的知識；不能認識世界，就不能改造客觀世界，必然在客觀世界面前表現得無能為力。可見馮先生主張理論應該和實際分離，哲學系培养脫離實際的理論工作者正是他一貫的哲學觀點。

馬列主义哲学以自然和人类社会为研究之对象，总结了生产斗争經驗和阶级斗争經驗，就获得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一般規律的知識。虽为一般規律的知識，因为正确反映了客观世界的发展規律，所以就能用于改造客观世界，指导每一件工作。馬列主义哲学指导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革命与建設胜利，証明它是唯一正确的哲学，这正是与馮先生的哲学思想針锋相对的。

經過分析，我們还可以发现，現在的社会分工論，就是解放前“新理學”中科学与哲学分工論的再現。过去馮先生从科学与哲学完全不同的“兩种學問”的錯誤观点出发，認為科学研究之对象是实际，哲学研究之对象是真际。因之他認為科学的命題可以是对实际的知識，“可以用于統治自然，統治实际”，哲学以真际为研究对象，不是对实际的知識，因之哲学命題对实际沒有作用。这当然是十分錯誤的謬論，科学与哲学同样以客观实际为研究之对象，并都反映它們的規律，只是某具体科学以客观世界某些具体事物为对象，而哲学則以整个客观世界为研究对象，一个是客观世界及人类思维一般規律的知識，一个是某具体事物的規律。所以應該說哲学也是一种科学，并不是完全不同的“兩种學問”。至今馮先生仍然堅持自己过去这种錯誤，主張理論工作和实际工作在我們的社会里也自然有分工。具体一些說：过去認為科学的命題可以用于統治自然統治实际，依今天的話來說，科学工作是“單搞或多搞实际”的工作，可以解决实际問題。过去認為哲学不能解决实际問題，对实际沒有作用，就是今天社会分工論中，哲学工作應該是不解决实际問題的理論工作的意見。哲学系依据这种观点当然是培养脱离实际的理論工作者了。

在新理學中，馮先生还是給哲学提出过任务的，他說：“哲学可以說是無用。如其有用，亦是無用之用。”無用之用是什么意思呢？他說：“以心靜觀真际，可以使我們对真际有一番理智的了解，可以作为講人道的根据。对真际有同情的了解，可以作为入聖域的門路。”这就是馮先生一貫的主張，哲学不是認識与改造世界的工具，

哲学活动乃是他所謂“聖學”的一部分。他的哲学研究之对象——真际，就是“理的世界”，它是沒有任何具体內容的东西，等于是沒有印字的書“無字天書”。他說：这种天書，有人能讀懂，有人不能讀懂，能讀懂的就了解每个社会有每个社会之理，并能根据此理之基本規律以行动。因之这些人是所謂“君子”、“才人”、“聖人”。这当然是客觀唯心論的謬論。他这种把所謂“聖學始于哲学活动、終於道德行为”的荒謬思想，其实就是叫大家要想当“君子”、“聖人”要了解每一个社会有每一个社会存在的道理，要大家依照这个社会的道德規范为人作事。就是說叫大家不要推翻那个蒋介石的王朝，因为它有它存在的道理。大家要依照他講的 封建人道，“仁”、“义”、“礼”、“智”、“信”蒋介石新生活手則一类的东西生活，不要“犯上作乱”、不要革命。用旧道德来束縛人民的手足，阻碍人民革命。

另外这种一片“空”、“灵”的真际、“無字天書”，聖人認識了它，是聖人起塵出聖的門路。他說：聖人在讀懂無字天書时，自己覺得自己已經超乎經驗、超乎自己的精神境界。此时，则是所謂“我心即天心”、“覺得天地万物与超乎自己的自己均为一体”，成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不怕死生”的地步。我們說这簡直就是中国旧小說上的超塵出世的神仙了。这里馮先生已經不是講哲学，而是宗教的講經。在宗教的說教中，說教主可以憑自己的灵感經過上帝的啓示，立刻頓悟，讀懂“無字天書”，成为“金口玉牙”，代表上帝或天地說話，就是馮先生这种意义。这里表明了馮先生的哲学脱离实际，流入宣傳宗教神話的悲剧。这种結局是必然的，因为馮先生，承認一个客觀存在的“理”、“真际”。这种客觀唯心論謬論，必然認為它是不可知的，因为世界上沒有这样一个东西，当然沒有人認識它。要有人認識，只有憑上帝啓示。唯心論必然的走入神秘主义。

这种認為哲学活动是脱离实际，作为道德修养，脱离塵世而进入天国的門路的腐朽思想，完全反映了馮先生当时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資产阶级鄙視現實，鄙視实际，鄙視劳动。和在人民革命运动不断高

漲的情況下，一部分人沒落的情緒，眼見自己的階級要崩潰、要被推翻想逃避現實，把哲學活動作為逃避的門路。最主要的是這一套哲學，是一套配合蔣介石王朝鎮壓革命運動，思想上麻痹人民的工具，大家都遵守封建的人道，不管塵世間的事情，想修化悟道，則蔣介石的天下可以“穩固下來”。這裡馮先生完全是反動政權的帮凶。

事隔二十多年，中國人民已經在共產黨領導下，取得了革命的勝利，馮先生那一套謬論早已為革命事業和馬列主義哲學的原理批判得應該說無地容身了。但今天馮先生還宣傳什麼哲學系培养是單純理論方面的人才，抽象的鑽研理論。所謂鑽研經典著作、分析概念范疇，鄙視實際、鄙視勞動。難道馮先生還覺得自己過去那一套还不够荒謬，还不够腐朽，自己的毒素還放得不够，今天還要繼續放下去嗎？我們說，不行，要立刻停手。

從“樹立一個對立面”一文中我們還可以看出，他那一套反動的為“帝王師”的思想目前也在作怪。解放前出版的“新原人”中，馮先生給自己提出的任務：“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自己把自己完全打扮成了一個大聖人。認為自己繼承了中國哲學及世界哲學的“道統”並要求得到當時政權的承認，因之與國民黨反動政權結合。給國民黨一些學校講“中國固有的哲學”，自認為實現了哲學家為“帝王師”的思想。其實就是思想上的腐朽與反動，走上政治上的反動。解放後自己這種反動的思想沒有放棄，在進步日報上發表了“哲學家當前任務”一文中，不滿意大家說共產黨掌握了馬列主義哲學，不但可以說明世界，而且可以改造世界。因為這樣一來，馮友蘭先生這一位“大聖人”，大哲學家就不但不能成為共產黨的老師，簡直就沒有地位了。因之他當時主張，共產黨改造世界是好的，但解釋世界，還需要他們這些“哲學專家”來擔負這個任務。今天仍然由這個思想出發，不滿意黨政部門的負責同志是哲學家，沒拜他為師。因之說有“哲學家”與“哲學工作者”之分，認為黨政部門的負責同志，能根據實踐經驗發展理論，是哲

学家，但他們不能搞哲学工作，不是哲学工作者，他們是沒有學問。要像他那样的所謂“系統鑽研經典著作、掌握文献資料、联系科学、分析概念范畴”的人才是哲学工作者，才能作哲学工作。表面上給党政部門的負責同志戴了一个哲学家的帽子，其实是說他們沒有學問，不能作哲学工作，是鄙視他們。認為自己有學問，他們要向自己学习。这仍然是对共产党不服气，对党政部門的負責同志不服气，自己反动的为帝王师的思想作怪。

通过上面分析，我們可以看到，馮友蘭先生的哲学打着不联系实际的幌子，其实是叫別人学哲学不要联系实际，就是叫別人不要推翻蒋介石王朝，不要革命，而学哲学走入道德修养，和超塵出塵的道路，这正是他在联系实际。列寧說無党性，正是資产阶级的党性表现。这里也可以說馮先生叫別人不联系实际，正是馮友蘭先生在联系实际。

* * *

这种反对理論联系实际的荒謬哲学观点，一直是馮先生引导青年脱离革命，反对共产党的政策，投降帝国主义，帮助反对政府鞏固其統治政权的手段。

一九三六年七月三日，清华大学举行了哲学与救亡关系座谈会，学生要求馮先生出席，馮先生因事未到，会上学生们討論了兩個問題，“一个是救亡过程是否需要哲学”，“大家一致認為救亡过程需要哲学”；另一个問題是需要何种哲学，大部分人一致認為需要辯証唯物主义。如該会主席說：“辯証法唯物論从历史发展中，指出救亡运动的前途。在中国救亡运动中，須建立起一种統一的斗争的人生观。这斗争是实践和理論的統一。”會議上实际也批判了該年伪中国哲学会后馮先生在“对本年哲学会年会之感想”一文中說，“哲学是專門的与現實無关”，“各国有官哲学，人民又無需政治社会哲学”，“哲学与民族解放，中国哲学会担负不了；哲学会不打算做而且不能做。”但事后馮先生在清华周刊救亡專号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对于哲学一点意見”。馮先生回答学生討論的兩個問題时，回答救